



传文考

——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

[美] 丹尼尔·W.费舍 (Daniel W. Fisher) 著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丛书主编 周振鹤
译者 关志远
苗凤波
关志英



[美] 丹尼尔·W·费舍
(Daniel W. Fisher) 著

B979.971.2
7

狄考文^传

——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

关志远 苗凤波 关志英 译

Q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BY DANIEL W. FISHER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11

原书封面

狄考文传

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

[美] 丹尼尔·W. 费舍 著

费 城

威斯敏斯特出版社

1911 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 /
(美) 费舍 (Fisher, D.W.) 著；关志远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 / 周振鹤主编)

ISBN 978-7-5633-9294-0

I. 狄… II. ①费…②关… III. ①狄考文 (1836-1908) —
传记②中国—近代史—史料—清后期 IV. B979.971.2 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852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望州路 251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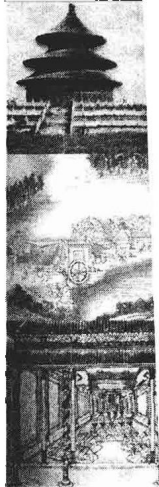
开本: 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15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4 000 册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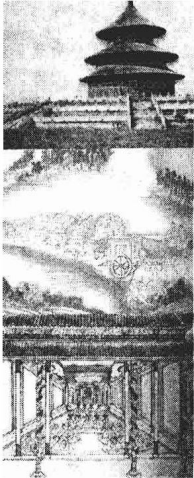
《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序言

周振鹤

传记就是历史。中国的廿四部正史,全部是纪传体体裁,大致由本纪、列传、表、志四类不同形式的文字组成,其中列传主要就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占了所有正史里的最大分量。本纪则是帝王的活动记录,也可以视为他们的传记。所以我们不妨可以说历史主要是由传记组成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宰,所以人的传记自然就是历史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西方的情况与之相类似,用历史学家 Heinrich Simon 的话说,传记是最好的一种历史。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袒露在我们面前,那么他所思想和他所做的一切,就给我们一个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的较好的领悟,比其时所有总的记录可能给我们的还多。因此重视传记就是重视历史,阅读传记也是阅读历史。这就是出版这套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在学术上的一般意义。

这套丛书还有其特殊意义。那就是从晚明以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可以笼统地说,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但从晚明到清代中期,能深入内地,能深入宫廷与民众之中的人只有传教士,甚至在乾隆年间严禁传教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传教士秘密进入内地。而商人历来只能活动于澳门与广州,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沿海港口,至于外交官则只有使团性质的短暂停留。晚清以后,商人与外交官的活动显著加强,但传教士来华的活动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深入,其影响程度依然远在外交官与商人之上。

与此同时,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度较高者,其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并不在传教的成绩方面,而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好有坏)。他们在中国登堂入室,不仅影响一般人的普通生活,甚至还参与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干预了



中国的外交活动。其中有不少人或者留下重要著作,或者介绍中国文化于西方,或者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于中国。有的甚至成了汉学研究的先驱或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虽然传教是他们的最重要使命,但其实有的传教士在这方面完全乏善可陈。例如德国的传教士卫礼贤就曾经说过,他在中国从未成功劝导过一人入教。所以无疑地,通过阅读传教士的传记或与传记相关的资料,我们又无异于在加深对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了解。

当然,传记并不总是全部可靠的。因为写传记的人与传主的关系可能会影响传记的可信性。与典章制度的记载不一样,历史上这方面事实基本上是秉笔直书的,但人物传记不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在中国都是儒家的教导,在外国也未必不如此。加上私人之间的恩怨或利害关系,就使得传记会有不实的成分。同时传记也不好写。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叙述事实以外,还要对传主有所评价。而历史人物的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中的难题。对于大部分的历史人物很难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评价,甚至是最公认的雄才大略的爱国者或是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历史人物的所谓定评还可能随时被推翻,而作翻案文章也始终是最有卖点的工作甚至是特别的成就。而如果这些传记牵涉到来华的外国传教士,那么问题就更加复杂。

基督教入华有过四次间断的过程。其中后两次,即晚明至清前期天主教传教士,以及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更为重要。直到1949年以前,在华的外国人中,仍以商人、外交官与传教士三种人为主,其中传教士的数量最大,如果倒退到晚明清初,绝大部分在华的外国人差不多都是传教士。无论明清之际或晚清,这些传教士在中西关系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的甚至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所以很自然地,在汉学领域里打先锋的都是传教士,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如此。传教士的第一目的自然是传播基督教义,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贡献中国文化所欠缺的东西,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于是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就成为传教的媒介。为了传教他们还必须学习甚至精通中国语言文字,他们也由此理解与研究了中国积淀数千年的丰富博大的文化,在17世纪与18世纪之时他们将这一文化的详情(有时不一定是精髓)以各种方式传播到欧洲去。当时的传教士研究中国有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其有何实用价值。当然他们也有所图,那就是在欧洲文化出现危机时,试图以中国文化来济欧洲文化之穷。虽然这只是一愿望,但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重视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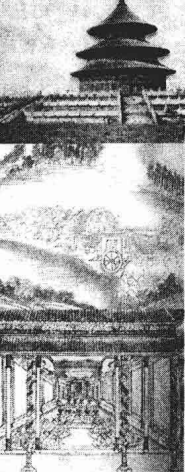
当法国在1815年正式建立起汉学讲座,标志欧洲汉学研究的纯粹学术化,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变成一门学科的时候,其实是传教士奠基了两百多年中国研究以后的必然结果。同样英美等国汉学的建立,也是新教传教士筚路



蓝缕的结晶。这些传教士不但是开路先锋,而且本身具有很好的素养与研究成果。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我们不能无视传教士的功绩与影响。除了学术方面,清初的传教士还影响到中国的宫廷生活甚至皇帝的某些决策,在晚清则甚至干预到中国与列强的关系,有的传教士的确在中外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所有这些都应该得到很好的清理。而传记的写作与翻译就是这种清理工作的具体体现。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学术上对传教士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有传教士都被视为文化侵略者,尤其是新教传教士大多是在鸦片战争后借枪炮俱来,除了文化侵略以外,还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凶。近些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所进展,但又出现另一种倾向,似乎所有传教士都完美无缺,都是中外关系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实际上,这样两种倾向都是缺乏历史理性,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为了正确地认识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做一些基础性的建设工作,也就是将四百年来的传教士的活动进行具体而微的研究,而不是大而化之的空论,而其中最直接具体的莫过于传教士传记的撰写,将每个传教士的言行完整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工作西方学者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因为他们有资料方面的优胜条件。虽然西方学者的这些传记未必尽善尽美,但在我们未曾有自己撰述的新传记以取代它们时,我们不妨先将这些传记翻译过来,以作为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实际上,由于这些传教士的主要传记资料都在西方,所以即使我们有意重写这些传教士的传记,我们也不得不大量依靠西方的文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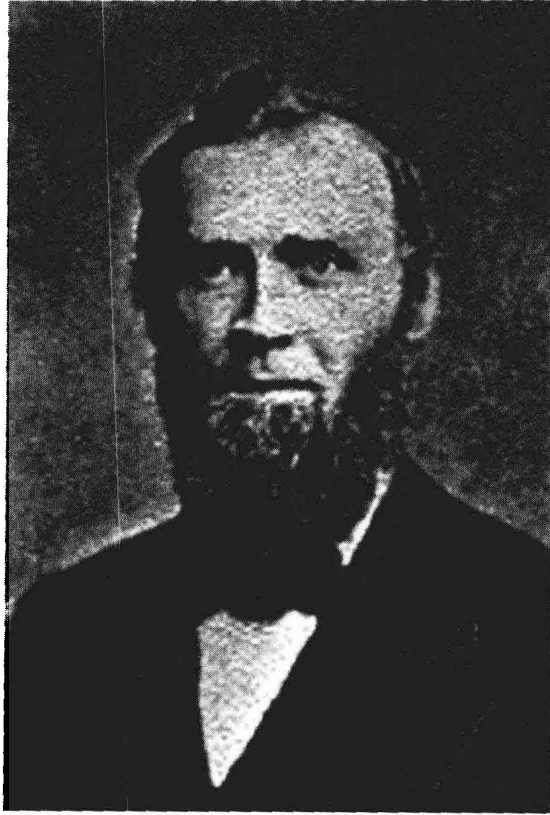
对于晚明清初天主教士的传记已经有人进行过很好的研究,有些已经翻译过来。而对于新教传教士,因为禁忌较多,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即使早有传记行世的,也始终没有人进行翻译。例如作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他的自传性质的《花甲忆记》,就始终没有全译本。对于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虽有不止一种传记译本,但对其夫人所编辑的保持原始资料较丰富的《马礼逊回忆录》以及《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也始终无人译出。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这套丛书的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将尽可能原始的材料翻译给那些没有太多时间去找原著,或读原著比较费时费事的读者。选取的原则首先是以本人的回忆录或书信集为主,其次是他人所写的传记。传记里头又以作者为传主亲近者为先,其次才是专家所写的学术或思想评传。目的不为别的,主要是为了先把比较原始的资料呈现给大家,而暂不作任何评论。如果要说的话,也是由读者去做,译者与主编者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任何高明于读者之处。这就是编辑这套丛书的



宗旨。而且这样做对历史研究还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因为越是原始的材料往往越能够体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本丛书中的《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就比较直接地暴露出了卫三畏的一些殖民者的观点与行为,其中对中国人的蔑视、提倡侵略中国的必要,都是通过他自己的书信表现出来的,让我们更能充分认识其人的全貌。也许今天的学者为其写传记,担心触怒中国人民的情感,倒可能删去一些内容,这反而掩盖了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尽量选取原始的传记资料的另一个原因。相信读者是不会以为译者、主编者与出版社同意或赞赏传记中所呈现的传教士的错误观点与行为的。

宗旨确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荦荦大者有二:一是传记原著本身的不足。有的传教士很有名,但却没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如傅兰雅,如伟烈亚力,都是19世纪来华的鼎鼎大名的学者,而且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但在西方至今未有一本传记问世。傅兰雅,还有人为其做了一本类似年谱长编的未出版的稿本,而关于伟烈亚力,则只有一些纪念性文章而已,颇令人感到遗憾。二是难译。难译主要不体现在原文的艰深,而是复原的难度。中国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与其他专用名词从西文回译到中文,有时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丁韪良在《花甲忆记》里头提到某天总理衙门的三位值班大臣时,说他们分别姓xu(阳平)、xu(上声)、xu(去声),乍一看,会以为丁是为了说明汉字四声读音之难而编出来的,未必真有其事,而且前两个音可以复原为“徐”与“许”,第三个拼音则颇费踌躇,后来查了当时的文献,才知道确有其人其事,第三位是蒙古族,其名字头一字是“续”。这查核文献之工夫有时比翻译本文的时间还要费得多。所以译者不但要精于西文,而且要熟悉中国历史文献与历史事实,才能使传教士传记达到杰出的翻译水平。

所幸这一丛书的头三本,即《花甲忆记》、《马礼逊回忆录》与《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都有很好的译者,他们不但英文功底深厚,而且对所译传记的传主都有深入的研究,发表过有关的专门的论著。在译作如林的今天,读者一定会对他们的翻译水平作出正确的评价。



狄考文博士

序

应费舍博士(Dr. Daniel W. Fisher)^①之邀,为他写就的已故神学博士、法学博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D. D., L. L. D.)之传记作序,实乃荣幸之至。我与狄考文博士交往甚密,彼此通信往来达13年之久,并曾亲赴中国拜访他。他的一生在基督教传播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这一领域至今仍无人可与之匹敌。1863年,他和年轻的妻子以及郭显德^②牧师夫妇(Rev. and Mrs. Hunter Corbett)乘船从纽约出发,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时年28岁。他们所

① 丹尼尔·韦伯斯特·费舍(Daniel Webster Fisher, 1838—1913),狄考文在大学和神学院时的同学,后来担任美国汉诺威学院院长,十分关心国外布道事业,两人长期通信。狄考文去世后,他用两年时间阅读了大量狄考文生前的日记和各类信函,写成《狄考文传》。——译注(全书脚注除特殊说明,皆为译注)

② 郭显德(Hunter Corbett, 1835—1920),来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64年初与狄考文等一起到登州,1864年秋,迁至当时之珠玑村,1865年末迁烟台毓璜顶(亦作玉皇顶,而且是本来的名称。自长老会进驻之后,由于宗教的原因,改称毓璜顶,虽然一度受到官绅的强烈抵制,但最终还是相沿成习)。1867年,郭显德主持创建了毓璜顶长老会礼拜堂。郭显德在烟台毓璜顶和附近胶东各县创办小学共40余所。其中毓璜顶文先小学(男校)和会英小学(女校)开办于1866年,是烟台最早的西式学校。后来发展成烟台益文商专,即今烟台二中前身。郭显德夫人苏紫兰则在毓璜顶创办著名的毓璜顶医院和烟台第一个幼稚园。1920年郭显德在烟台去世。郭显德传教广泛撒网,颇有建树,初期遇有冲突,多能隐忍,且动辄以儒家道理与人理论,时人送其绰号“郭麒麟”。



乘坐的是一艘航速极为缓慢、条件极为恶劣的帆船，整个行程历时达六个月之久。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就在不久前的1863年，一次前往远东的航行竟然是如此艰难的一件事情。事实上，这次航行的艰辛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以致他们一行人中有好几位的健康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艰难困苦并没有随着这些年轻的传教士们抵达目的地而消失。那里的人们并不怎么友好，生活设施也极度匮乏，寂寞和孤独更是令人难以忍受。但是这群年轻的传教士有着大无畏的精神，并以他们极大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推动着工作的开展。很快，郭显德先生就成为福音传播工作的带头人，而同样深深热爱着福音传播工作的狄考文博士从旁给予了有力的帮助，与此同时，他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教育工作。1864年，就在来到中国一年之后，他与极具天赋和奉献精神的妻子一道设法招收了六名学生。当时既没有课本，也没有校舍，更没有什么帮手；但是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深邃的洞察力，狄考文博士夫妇全力投入了创立一所大学的艰巨工作之中。一座座校舍得以妥善保护，虽然破败不堪、条件简陋，但这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亲自编写课本，亲手制作了大量的教学仪器和设备。很快，他就向世人证明了他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行政管理者的非凡能力。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少年聚集在他的身边。学校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从一开始，狄考文博士就坚持用汉语教学，管理上要最大限度地体现仁爱，而基督的精神则要贯穿始终。经过35年不懈的努力，无情的岁月让他最终把学校未来的管理重担移交给了他人，但他却欣慰地看到他一手创办的大学已被公认为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他的继任者在潍县(Wei Hsien)^①进一步扩大学校的规模，从而形成了今天广文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的文理学院(Arts College)。

狄考文博士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还是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他从学校的管理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学领域，其间只有一年的时间，因学校管理岗位空缺，他不得不再次担负起这一职责。他的汉语水平相当出色。他编纂了许多教科书和中文书籍，部分是他自己写就的，部分是翻译过来的。他晚年担任了《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修订委员会(the

^① 今山东省潍坊市。

revis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Chinese) 的主席,这项工作也是他极为钟情和热爱的。

狄考文博士是一位有着非凡能力的人物;他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学者,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费舍博士时任院长的汉诺威学院(Hanover College)很早就发现他是一个有能力、成大器的人,因而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Divinity),并在1903年再次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Laws)。我们因再也无法得益于他的教诲而深感哀痛,但是他已为我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努力取得的成果将会长盛不衰,他的名字将会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历史上占据突出的位置。

费舍博士为斯人作传对于传教事业乃至整个教会都是巨大的贡献。作为狄考文的同学和终生的知己,他站在资深学者和教育家的高度,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对传主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以及令人钦佩的清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写就此传。我敢断言此书及书中对狄考文博士为之奉献了一生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介绍一定能够给所有读者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引起强烈的共鸣。

亚瑟·贾德森·布朗^①
于纽约市第五大街156号
1911年4月13日

^① 亚瑟·贾德森·布朗(Arthur Judson Brown, 1856—1945),美国长老会的牧师,也是普世基督教大联合运动和世界传教士运动的先驱。曾在担任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执行秘书期间,于1901年至1902年和1909年来过中国。旅行所到之处甚多,对远东新兴国家的问题有不少论著,并兼任过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校的校董。主要著作有《古老中国的新生力量》(*New Forces in Old China*, 1904);《中国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2)等。

前言

当我应邀为狄考文博士作传时，我已着手开始另一部作品的写作，并已完成了一些准备工作；但我还是立即放下手头的活，投入到本书的写作之中。之所以这样做，有几个原因。尽管我和狄考文博士不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然而，从我们进入大学和神学院那天开始，我就逐渐走近了他的生活，此后我们一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时常和他通信，也十分关心海外布道事业，因此，我对他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我对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高兴，所以将神学博士学位正式授予了他，而这也是他当之无愧的。我和另外几位他大学时的同学一致认为他是我们中间最可引以为荣的人。当我辞去神学院院长职务之后，他立即写信来建议我利用退休后的时间作一次中国之旅，用我的口和笔为这些从事福音传播工作的人们做宣传。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给我寄来了有关这次中国之行长期发展方向的建议信。在我十分意外地接到了让我为他立传的邀请之后，岂有推诿不从之理？

我写作此书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一个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表都真实的狄考文博士介绍给读者：他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基督徒，同时还是一名传教士。为了

做到这一点,我在书中大量地引用了他本人的言词。除此之外,我还尽可能地既不隐瞒也不夸大任何值得保留的情节。在我着手为写作此书进行资料准备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认识到狄考文博士和他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他的事业是如此伟大。如果读者无法从书中体会到这一点,那就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真是那样的话,只能说是书中叙述的言语有瑕疵和不够准确,而并非书中所涉事情本身的问题。

狄考文博士的许多亲朋好友无偿地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在此,我本不该提及他们的名字。然而,我还是要感谢 J. M. 柯克伍德夫人(Mrs. J. M. Kirkwood)^①,本书《家乡》一章的大部分内容取材于她此前已完成的专著。我更要感谢狄文爱德(Mrs. Ada H. Mateer)^②,她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多方面的帮助:首先,她把手头已有的资料整理好后交付给我,从而大大减轻了我的工作量;继而她又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并且亲自为本书添加了大量补充性的内容。

丹尼尔·韦伯斯特·费舍
于华盛顿
1911年

① 即狄考文博士的大妹珍妮。

② 狄文爱德(Mrs. Ada Haven Mateer, 1850—?),即狄考文博士继室夫人。原名文爱德(Ada Haven)。1879年来华。先后兼美国公理会及北长老会。1900年到登州,1904年随狄考文和文会馆迁潍县,狄考文去世后长期在潍县长老会工作。

目 录

序	001
前言	001
第一章 家乡	001
出生—坎伯兰谷地—家庭出身—弟弟、妹妹、父母、外祖父—迁至“隐居处”—农场生活—在家里—青少年时代的故事	
第二章 长大成人	010
家乡的滋养—家庭的影响—结识一位乡村小学校长—在亨特斯敦学院— 在镇区小学任教—在邓拉普河学院—公开发表入教誓言—杰弗逊学 院—我对狄考文的回忆—杰弗逊学院的教师们—1857年的毕业班—一封 纪念毕业50周年的来信	
第三章 选定终生事业	018
母亲与国外传教事业—比弗学院—决定做一名牧师—西方神学院—教职 员工—宗教奋兴运动—对传教事业的兴趣—获准传教—考虑将传教作为 终生职业—做出决定—俄亥俄州特拉华镇—延迟出行—圣职授任—结 婚—终于启程	
第四章 开赴一线	030
确定前往中国山东省—海上航行—一路上的艰辛和考验—到达上海—乘	



船前往芝罘—船只触礁—在海滩上迷路—获救并到达芝罘—坐撬子到达登州

第五章 新家 039

狄考文夫妇的居所—当时的登州—在登州开始传教工作—观音堂—制作炉子和煤球机—独自住在观音堂里—观音堂的缺陷—建造新家—家庭生活

第六章 精神生活 051

并非一个梦想家—慈悲之心—获得重生—转意归主—有关宗教体验的记录—痛苦和解脱—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宗教生活的尽善尽美—忠诚于自己的信念

第七章 从事福音传播工作 064

学习汉语—障碍—开始说汉语—登州的小教堂—山东省—出行方式—几次出行经历—第一次乡下之行—中国的旅馆—一次为期四周的巡回传教—到潍县—对外国人的敌意—骚扰行为—与狄邦就烈一起进行巡回传教—中国的皈依者—到省会和泰安—减少巡回传教的次数—后来的几次出行

第八章 登州蒙养学堂(文会馆) 079

蒙养学堂的创建—教育和传教—首批学生—资助的手段—不使用英语进行教学—学校的发展—一天中的课程安排—对学生的关爱—校规校纪—一次自杀未遂事件—第一位学生转意归主—首届毕业生—休假归来后受到的欢迎—进一步的发展—学校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第九章 负责美华书馆事务及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096

为期刊撰稿—英文书籍—上海美华书馆—担任美华书馆临时负责人—约翰·马蒂尔—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早期完成的中文书籍—学校用教科书—《北平官话字典》—《官话课本》—对出版物严谨的态度—金钱上的回报

第十章 对当地基督徒的关爱 112

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登州的教会—教规—登州蒙养学堂的男童转意归主—在登州担任临时代理牧师—被推选为牧师—作为一名传经布道者—